

媒介時間之「內化」： 電子媒介社會的時間紀律及其形成

卞冬磊*

《摘要》

本文探討人類時間觀念尤其是當下「媒介時間」的「內化」過程。作者認為，自然、鐘錶與媒介時間各觀念，在各自社會分被「內化」為「順時」、「準時」與「即時」三種紀律，成為普羅大眾必須順從的社會制度或文化約束。在電子媒介社會，媒介時間形成了「即時」時間紀律，即建立於時間表之上的即時行動、與對時間流程「瞬時」與「同步」之要求。

本研究一併探討了促進時間觀念「內化」背後的多種社會力量。總體而言，生存壓力、宗教信仰、大型社會組織之運轉、技術傳播，是促進時間「內化」之主要力量，而在電子媒介社會，推動「即時」時間擴散之力量主要為媒介技術之普遍運用、工作進程之權力因素、社會組織之利益競逐、人際交往之隱形約束。

面對錯綜複雜的時間紀律，作者僅能呼籲人們提高對時間的認知與領悟，發展在不同時空裡適應與平衡不同時間紀律之能力，因為我們就生在時間之中，無法也無需全然抗拒時間的約束。

關鍵字：內化、即時、時間紀律、媒介時間

* 作者卞冬磊為南京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教。E-mail: biandonglei@gmail.com。投稿日期：2008年09月27日；通過日期：2008年12月。

壹、緣起：時間觀念何以深入人心？

時間乃人為建構，是在社會再生產實踐中產生的觀念。因而，它顯非與生俱來，呱呱落地的嬰兒顯然缺乏普羅大眾所慣常的時間意識：他／她常未到一日三餐時就已迫不及待嗷嗷待哺，也較多會在白日裏酣睡而在夜深人靜時嚎啕大哭，從而攪亂了年輕父母的生活節奏。但隨著年齡增長，這種不遵守「紀律」的現象會逐漸減少，他／她的時間意識與行為大抵可以與社會步伐保持一致。

同樣，在人類社群的童年階段，時間意識的發展也極為緩慢。遙想蒙昧之時，先民肯定沒有你我對時間這般熟稔於心，即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基本習慣，也是他們與自然界長期調適的結果，更不要說「依時而種」這樣有難度的定時技術了（Elias, 1998 / 劉佳林譯，2005：238）；而「時、分、秒」為十七、八世紀的勞苦大眾接受也經歷過一段浩浩蕩蕩的認同與抗拒（Thompson, 1967），他們從「看天吃飯」式的自由懶散轉變至「朝六晚六」式的循規蹈矩，頗為不易，甘苦遠非對鐘錶已了然于心的當今世代所能體察。

因此，無論是個體短暫的一生，還是人類社群的綿延歷史，時間意識的成長並非一蹴而就，學習、理解與接受時間，可謂生而為人的普遍經驗。然這一「時間化」過程並不自然發生，而是內外力量交織，經歷「馴化」與「反思」後，人們才將相同的時間概念植入內心，於社群之間彼此共用，以保持行動的協調一致，此即可謂之時間觀念的「內化」（internalizing）。

「不同的社會培養不同的時間觀念」（Harvey, 1990 / 閻嘉譯，2003：242）。筆者曾謂，伴隨電子媒介擴散之步伐，人類的時間觀念在自然、鐘錶時間之上又衍生新意，而漸向「媒介時間」過渡。曾幾何時，先民的身體與自然界緊密糾結，生命的節奏與日月星辰之流轉、自然生物的新陳代謝協調一致，可謂處於一種順應天時的「自然時間」狀態；爾後，鐘錶發明與擴散、交通工具急需時刻表、工廠運轉引入時間制度等因素，使人們的定時標準始而從多樣化的自然界變成「放之四海皆准」的數字，「鐘錶時間」遂才走進日常生活；而近年資訊化社會面貌初

顯，電子媒介包括廣播電視、網際網路、移動電話等迅速成爲不可或缺之工具，也因其孕育的「媒介時間」意識與前有所不同，旋即給帶電子媒介時代的閱聽人以別樣的生命體驗：電子媒介不僅部分取代鐘錶成爲日常生活定時之原型，更在影響人們時間感知方面以瞬時、零散、無序取代自然時間之緩慢循環、鐘錶時間之線性流逝，並進而影響人們對社會的認知、解釋甚至採取的行動（卞冬磊、張紅軍，2007；卞冬磊，2008）。

誠言之，由電子媒介技術帶來的時間壓縮現象，以及衍生的「即時時間」、「網路時間」、「速度社會」等概念，已漸成爲學界的常見術語，甚且也是一般民眾的常識性體會。在學術研究上，「時空轉型已被視作社會變化之根本因素，時空之間的變動關係乃社會變化之關鍵特徵」（Bauman,1999 / 歐陽景根譯，2002：9），媒介時間之相關論述亦源於此。

然而，時間概念雖常在社會轉型研究的長篇巨著中占重要角色，卻往往不是言說之重點。論者常將時間轉型作爲既定的存在，寥寥數語後便迫不及待地轉而論述起政治、經濟、文化的變遷，電子媒介之即時性時間如何衍生，怎樣擴散，何以沉澱，時間觀念滲透進日常生活之方式，爲芸芸眾生所接受並成爲「社會共識」之過程，實缺少濃墨書寫。本文即懷揣將時間概念從「背景」解放爲「前景」之願望，嘗試從塗爾幹(E. Durkheim)之「時間乃一種社會制度」觀點出發，借傅柯(M. Foucault)之「紀律」概念，沿襲湯普森(E. P. Thompson)「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之研究路徑，論述時間觀念如何深入人心，成爲人們自覺遵循的準則，且特別探討媒介時間之「內化」、並進而在電子媒介社會形成「即時」時間紀律的過程。

貳、「植入內心，化成紀律」：相關概念之引介

一、「內化」

大多數社會科學之闡述都假定，時間屬於社會性範疇，從而與自然界的時間

相隔離與對立。Durkheim(1965)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即認為「只有人類才具備某種時間概念，這種抽象的、非人格性的時間以社會性的方式組織起來，時間因而可視為是一項社會制度」。

如此，「時間便是一種客觀給定的社會思維，它在社會中生成，也隨社會不同而各有差異」(Urry, 1996 / 李康譯，2003：506)。可以想像的是，社會運轉、人際交流實離不開時間的規範，否則人們便無法集體行動，形成交集，彙聚於同一時空之下，構建共同信仰的共同體。總體而言，普通人必須適應社會，在社會化過程中成為時間的主體，社會才可能有序前進。

時間的「內化」概念常鑲嵌於「社會化」內涵之中：「社會化是個人為適應社會生活，在社會環境中，經由教育或人際互動，認同並接受社會價值體系、社會規範、以及行為模式，並內化至個人心理，使之成為個人價值觀與行為的準繩」(張春興，2000：187)。Kelman(1958)則在分析受眾態度變化時，將個體心理機制分為「屈服」、「認同」和「內化」三個層次，若受眾認為訊息與自身價值觀念一致而接受，並引發意見與行為的變化，即稱之「內化」，可見「內化」是態度接受指標之最高層次。此外，教育心理學、知識管理學也分從各自角度涉及「內化」概念，或認為「人類心智發展，是經由個體與周遭環境產生的互動經驗，逐漸內化到個體的人之結構中」(Vygotsky, 1978)，或是將「內化」定義為「從『外顯知識』轉換至『內隱知識』的過程」(Andersen, 1999 / 劉京偉譯，2000：35)。「內化」可謂是發展人格、形成自我的重要過程。

質言之，「內化」並非被動屈從，而是社會規範透過一定力量取得個人認同、植入價值觀後進而影響行為方式的過程。時間正是透過「內化」方式，才深入人心，成為芸芸眾生自覺遵守的紀律，才對你、我以及你我構成的世界產生持久的約束。以「內化」這一態度接受之最高指標，建構時間概念之擴散，既表明時間在人類觀念系統中的根深蒂固，又可觀照時間意識生長的動態過程，人們對時間的認同與抗拒、接受與反思，皆蘊含在「內化」過程之中。

二、「時間」、「紀律」與「時間紀律」

時間是人類經驗中最為複雜亦無可迴避之現實，人們常困惑於時間的表達。Husserl（1980 / 楊富斌譯，2000：9）曾言時間「從數字上講只有一個」，但人們對時間的把握有兩種方式：「經驗世界的時間與意識流的內在時間。前者為客觀時間，全部事物和事件在其中具有它們確定的時間設定，並可由計時器來測量；……後者是對客觀時間出現於其中的體驗之理解，是關於時間客觀感覺及其描述性內容的體驗問題，被感覺到的時間材料附加了理解的特徵。」與此相似，吳國盛（1996：10）之解釋則更顯淺白而能使普通人有所體悟，他說：「人類所有的時間經驗可分為兩類，一是關於時間定位的標度時間，一是關於人生短促或無聊的慨歎，它總是對時間之流的感悟。」

時間概念固然高深莫測，甚至具備不可知的成分，但對時間的探求從未停止。依上述分類方法，人類的時間經驗或可清晰地劃分為對事件的「定時」與對時間流逝的「感知」。Elias（1998 / 劉佳林譯，2005：261）早就說過：「今天我們所認識的時間就是一種定位方式，……定時(to time)是根據社會認可的標準來回答各變化之間的時間長度」，換言之，定時不過是人們按照社會約定俗成的標準（如兩次新月間的時間、牛吃草所需的時間、計時器之時、分、秒等）為事件順利展開確立的時間框架，用以協調彼此的行動；而對時間流逝的「感知」則是人們經歷事件時感覺到的時間流程，是我們對事件發生過程之時間的體驗，如快慢緩急、時間流向等；Urry（1996 / 李康譯，2003：509）也曾言：「人們並不怎麼太去思考實際的時間，而是以感覺的方式、以質的方式經歷著時間，時間根植在行動、事件、角色當中，人處於時間之中。」

因而，人類的時間經驗一方面由可測量的部分構成，即人們常牽掛於心的時、分、秒或其他約定俗成之標準，用以對事件的定時，起床、趕車、上班，皆無法逃脫時刻的控制；一方面則是透過內心才能感受到的時間流程，是對根植於事件之時間的感知，「愛因斯坦與漂亮女郎」的故事，即在說明「度日如年」與「時光

飛逝」之差別。

但時間與紀律何關？Foucault（1975 /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9：156）曾言：「紀律定義了人們如何控制他人的身體，不止讓他人做人們想要他做的事，同時還能讓他按照一定技術、速度與效率來加控制。紀律製造臣服與受過鍛煉的身體：『柔順的身體』」。依此，Foucault 就將對身體的控制細分為「建立時間表」、「行動在時間上更為細緻化」、「身體與姿勢的搭配」、「身體與物體的串連」、「對時間的徹底利用」五個步驟，時間作為一種控制的技藝因而成為典型的紀律。

人們可能對紀律有天生的反感，因為我們生來就處於權力結構之中，受控制的身體常歸因於時間的不自由。時間，它被透過不同方式予以紀律化：一是規範事件起始、持續時長的紀律，約束你我何時開始，何時結束，時間紀律因而表現為對行動「時刻」的控制；二是規範時間應如何被度過的紀律，約束你我如何使用、如何度過，時間紀律因而表現為對事件「流程」的控制。

因此，「時間紀律」可謂是對「時刻」與「流程」的控制，權力網路中的人、各級社會機制均須遵守相應的時間紀律。在日常生活中，我們顯然能感覺到，無論是時間作為行動的框架（如我們經常遇到的準時赴約要求），還是表達為心理的感知（如以最快速度高品質完成工作的壓力），均不同程度受到紀律的約束。

參、時間觀念之「內化」：人類時間紀律的總體樣貌

上節曾述，「內化」是社會規範取得個人認同、植入價值觀後進而影響行為方式的過程。自然、鐘錶與媒介各時間觀念正是在不同社會脈絡與不同力量的促進下，透過「內化」方式，才深入人心，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紀律。

一、「順時」與「準時」：自然、鐘錶時間之紀律

個人無法選擇時代，人們極少能夠逃避社會時間的馴化而自主生存。普通人無論自願或被迫，大多遵守時間紀律，以與社會步調保持一致。在自然時間時代，

時間紀律可謂之「順時」。彼時，「定時是被動的，幾乎不反思，……先民多少根據自己動物衝動的壓迫定時：餓了就吃，累了就睡。……當定時發展到較高水準，就會日入而息，日出而作」(Elias, 1998 / 劉佳林譯, 2005: 238); 待農業生產興起，先民的行動仍順應自然韻律，譬如，尼羅河畔古埃及人的農耕生活，「只需等待河水氾濫後，就可以安然播種了」(周穀城, 2003: 47); 而「布隆迪人」、「努爾人」一天當中的定時，也以「母牛到小溪去飲水、小牛吃草歸來」等牛的活動為定時標準 (Levine, 1997 / 範東生、許俊農譯, 2000: 121)。

在定日、定時技術成熟時，先民才能逐漸形成時間不斷流逝的形象。彼時，他們不曾有過與時間競爭或必須把活動與抽象時間推移等同起來的情感體驗，人人都遵循事物發展的自然流程。Evans-Prichard (1940 / 褚建芳、閻書昌、趙旭東譯, 2002: 123) 曾描述「努爾人」之時間經驗：「他們的參照點就是日月星辰之流轉與活動本身，這些活動一般來說具有緩慢從容、循環往復的特點。由於沒有任何各種活動所必須要精確遵從的自主性參照點，各種事件都遵循一種邏輯順序。」Levi-Strauss (1973 / 王志明譯, 2000: 66) 田野日記也記載：「當天空開始因日落而大放異彩的時候，在鄉村小路上行走的農民停下腳步，漁夫讓船漫無目的地漂浮，野蠻人坐在變得比較黯淡的火堆旁眨眼睛……」因而，自然時間之紀律，可謂是「順其自然」。

社會變遷及鐘錶發明使時間觀念發生巨大轉變，時間逐漸變成抽象的、均質化、可計算的數字，McLuhan (1964 / 何道寬譯, 2004: 187) 驚愕於此，認為其意義重大：「正如位置數、串聯數發現後，數學中就發生了一場偉大的革命一樣，人們發現可以把時間固定在兩點之間後，西方社會就產生了偉大的文化變遷。」逐漸地，時間完全順其自然、優哉遊哉的生活也一去不復返了，一種可稱作「準時」的時間紀律顯著起來。

「準時」紀律讓十七、八世紀的英國工人階級尤覺深刻。資本主義工廠要求他們必須準時開始工作，持續工作十多小時才能休息，在工作時間與休息時間之

間存在嚴格的界限。Foucault 如數家珍地描寫到：

工薪階級的逐漸擴大伴隨著對時間更細緻的劃分：「鐘聲響後，若遲到超過一刻鐘」、「上班時，若請假超過五分鐘」、「凡不準時工作者」；……與此同時，人們還設法確保時間使用的品質，如不斷地監督、監工的鞭策，消除一切幹擾，其目的在於造成一段充分利用的時間：「在工作時間，不得利用手勢或其他方式引逗工友，不得玩耍，不得吃東西、睡覺，不得講故事或笑話。」甚至在工間餐時，「不得講故事或進行其他會使工人分心的談話」，「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把酒帶進工廠和在車間喝酒」，精打細算並支付費用的時間必須是毫無瑕疵、毫無缺損的，這段時間應是高品質的，肉體應自始至終被投入其中（Foucault，1975 /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9：169）。

Foucault 描述之場景，當下社會並不陌生，鐘錶時間仍是縈繞人們心頭的緊箍咒。然而，資本主義工廠要有序生產，必須制定時間紀律，確立工作時間框架，確保「必要勞動時間」，才能取得「剩餘價值」；工人們為保有工作機會，就必須遵守工廠的時間表，在既定時刻按時上崗，完成相應的工作量。從中世紀的修道院流散出來的時間表，實是一項古老的制度，關於它的討論文獻俯拾皆是（Marx, 1867 / 郭大力、王亞南譯，1963；Thompson, 1967:56-97），其帶來的「準時」紀律也是今日上班族的切身之痛。

Bell 的觀察更加細緻，他曾將時間劃分為「空間變數時間」和「延續性時間」，並言「功利主義理性對延續性時間所知甚少，現代工業生活使時間僅按部就班地表現為鐘錶的滴答聲」（Bell, 1988 / 張國清譯，2001：250）。毋寧說是資本主義生產對「延續性時間」不聞不問，不如說鐘錶時間的流程已被控制與改造，用來追求效率最大化。由於鐘錶時間具備線性流程形象，效率邏輯使時間量化後，便可準確計算時間流程的產出，而與工作量掛鉤。上述所引 Foucault 之論述中，「高品質使用」、「充分利用」、「毫無瑕疵、毫無缺損」、「肉體應自始至終被投入其中」等，即是對時間流程的要求。鐘錶時間之「準時」紀律，在於必須遵守事件的起

始、結束時刻，更在於要求人們在相應時間完成可精確計算的工作量。

二、「即時」：電子媒介社會之時間紀律

與自然、鐘錶時間觀念不同，媒介時間之核心特徵是其擁有超出人們感知的瞬時性，對事件的時間流程而言尤顯特殊意涵。電子媒介雖無法取代鐘錶成爲主要的定時工具，卻消解著人們行動的時間框架；瞬時性使人們無法像對待鐘錶時間那樣注重時間流程，因爲電子媒介消滅了「命令／行動」、「需求／滿足」之間的時間差。本研究認爲，伴隨媒介時間之來臨，一種新型時間紀律逐漸「內化」，無論就行動的定時還是對事件流程的控制，「即時」之時間紀律逐漸擴散。

（一）基於時間表之上的「即時」行動

「時間表是一項古老的發明」，從十四世紀的修道院傳出，到如今的電子媒介社會，時間表向來是鐘錶時間的「準時」紀律的代言人。特別是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範圍內交流日廣，「地球村」共用時間表就尤顯意義重要，不僅個體要遵守時間表，民族、地區、國家也無可例外。

在媒介時間系統中，時間表遠未過時，甚至隨著全球化步伐加速、時間單位愈小而重要性日增。但在它的基礎之上，媒介時間之紀律又衍生新意，處於電子媒介網路中人們已被加諸新的約束，即須根據隨時到來的命令，即時調整自己的行動，時間表威嚴仍在，但生活中「計畫趕不上變化」的現象，也已逐漸司空見慣起來。

因爲，在媒介時間時代，電子傳播手段的完善意味著資訊的瞬間傳遞，移動電話、網際網路等構成的網路使即時通訊成爲家常便飯，人們無法「躲進小樓成一統」，逃脫權力監視的網路。McLuhan 很早就看出，電子媒介對社會控制至少產生四種影響：一是最高層可直接給最低層下達命令，到達基層後，由於其背後的權威，這些命令總是毫無批判地得到貫徹；二是許多辦公室與最高領導直接相連，於是它們直接收到有害命令而缺少中間環節；三是對公民的廣泛跟蹤；四是圍繞

罪惡行徑而實行高度機密措施。其後果是「產生一種新型的上下級關係，毫無批判地接受命令」(McLuhan & Zingrone, 1995 / 何道寬譯, 2000: 454)。

在這樣的傳播網路中，權力可以以電子信號的速度即時生效，「它已真正享有『治外法權』，不再受到空間抵制，甚至不會放慢速度（移動電話的出現可看著對空間依附象徵性的「最後一擊」）」(Bauman, 1999 / 歐陽景根譯, 2002: 16)。因此，只要人們處於電子媒介連接的網路之中，就處於了權力的結構之中，被監視的威脅（當然也包括監視別人的權力）便時時刻刻存在於權力關係被動一方的主體意識當中。

遙想沒有即時通訊的時代，由於地理位置的阻隔，人們很容易固定生活的時間框架，雖飽受上班、約會「準時」之壓力，各種事情終究可按部就班、彼此獨立、不受幹擾地發生。但滄海桑田，事易時移，電子媒介一夜之間遍佈社會，使各種命令、訊息可隨機而來，由於存在的權力控制，移動電話 24 小時開啓，網際網路之即時作業等，已成為隱而不顯的「軟」制度，常導致人們須根據最新的命令即時調整自己的行動。

新時間紀律顯然不局限於工作範圍，也不僅僅是權力運作之後果，人們在休閒時間也會遭遇不期而至的交流，隨時可能到來的電話、繁多的電子郵件、即時通訊的對話，都需要按電子媒介固有的節奏回饋，否則便可能因不符合常規而失禮。因此可以說，在電子媒介社會，人們一方面仍要遵循鐘錶時間之「準時」紀律，同時在也須處於一種隨時待命的狀態，遵守根據命令即時調整行動之紀律，兩者並行不悖，共同施加於人們的身心之中。

因此，當下的人們不啻處於全天候的控制之中，生活在「全時監獄」。全時監獄是「全景監獄」之延伸。全景監獄實行嚴格的空間隔離，「每個人被鑲嵌在固定的位置」，管理者處於「可監視而不被監視」，犯人處於「能被觀看而不能觀看」的狀態 (Foucault, 1975 / 劉北成, 楊遠嬰譯, 1999: 221)。但時間才是全景監獄的秘密，「權力的關鍵因素是時時刻刻都看得見犯人和時時刻刻都看不見監管人員這

兩者的結合。由於犯人根本不知監管人員是否在監視自己，……因此他們必須時時刻刻表現得仿佛他們此刻正在被監視著」（Bauman, 1998 / 郭國良、徐建華譯，2004：32）。

全景監獄之管理與資本主義工廠頗為相似，工人須在確定的時間到達固定場所，按照特定的要求度過時間，方能實現剩餘價值之生產。但如今之「全時監獄」，被看見與否並不重要，換言之，無論遠在天邊或置身荒野——身處何方並無妨，只要處於電子傳播連接的網路之中，命令即可隨之而來，在權力關係中處於被動的一方就必須遵守根據命令即時調整行動的時間紀律。

（二）壓縮事件流程直至「即時」

工廠流水線曾是社會的典型意象。彼時，生產被看作社會運作的中心，工廠工作順理成章成爲定義、營造日常活動之社會意義的重心，深深影響了「準時」紀律之傳佈。

隨著資訊技術引入工廠，即刻就有人放話：「泰勒式的生產線已成爲歷史的陳跡」（Castells, 2000 / 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292）、「資訊方式意味著馬克思所知的工人階級的結束」（Poster, 1990 / 範靜曄譯，2000：174），這明顯言過其實，工廠原型仍然廣泛存在。然而，我們也不應忽視資訊技術對工作的滲透：資訊的生產、分配與流通，重要性愈發顯著。

在傳統工作中，手藝人和流水線上的工人都與生產中所使用的材料有「伸手可觸」的關係，他們直接參與從原材料到成品的轉化過程，感官、心智及肌肉都被調動起來，時間就蘊含在機械運動之中，身心能夠確實地感知到時間的流逝。但電腦被引進擔負起工人與機器之間的仲介後，一種新的工人 / 主體得以建構，勞動不再是體力行爲，而更像是解讀符號的認知行爲。電腦瞬間自動化式的處理，壓縮了工作進程，遠遠超過了人類能夠感知到的時間意識（Poster, 1990 / 範靜曄譯，2000：175）。

「電腦不只是一種工具，它標誌著一個新的時間定向，它的速度是十億每秒，遠遠超出人的感知極限，在此之前，速度從未超出人的意識範圍」（Googale & Godbey, 1995 / 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2000：148）。電腦的速度讓掌權者認為幾乎所有的問題皆可簡化為速度和效率，可在最快的時間內處理完成，「彈性的管理形式、對固定資本的無盡利用、勞動的加強操作、策略性聯盟以及組織間的連接，這一切都導向縮短每個操作的時間，並且加速資本的周轉」（Castells, 2000 / 夏鑄九、王志弘譯，2001：534）。

除此之外，「隨著外控理性社會的來臨，消費逐漸成為社會舞臺之主角，工作就無法維持原有的中心位置，取而代之是休閒與環繞著它運轉的種種社會機制和活動」（葉啟政：2006：263）。這些社會機制和活動，出於利益競爭，常「劇烈改變時間之客觀性質」，努力縮短需求與滿足之間的時間差，以求得消費者的內心認同。這就強化了「即時」概念，人們樂在其中，因此「有時不得不以非常急遽的方式，改變我們向自己再現世界的方式」（Johnston, R., Gregory, D. & Smith, D., 1993 / 王志弘譯，1995：56-57）。

譬如，在新聞報導領域，追求時效早已成為媒介組織之重要原則。傳播學者 Schudson(1986)曾強烈批評新聞行業對即時性過分鍾情，可稱作是一種「媒介部落的落伍儀式」：「新聞工作者心中極為依賴對現在的戀情……，時間是新聞故事攀附的支架」。Bell, A. (1995)亦對即時報導有所微詞，他認為倒寶塔式的新聞寫作受新聞價值及傳播科技對真實時間的要求甚深，以致新聞組織愈來愈不重視事件究係如何發生或為何發生，僅是一味追求「何時發生」，其目的皆在縮短新聞報導與實際社會事件的時間間距（轉引自臧國仁、蔡琰，2003）。

而在電子媒介塑造的文化環境下，社會事件（客觀時間）、新聞時間（文本時間）、閱讀時間（閱聽眾主觀感知時間）之間的時間差正被努力壓縮，甚至歸零。廣播電視、網際網路乃至移動電話藉由衛星或光纖線纜，使資訊以光速傳導，「此時此刻」成為電子媒介的共同經驗。電子媒介之現場直播、即時報導已逐漸規範

閱聽人的審美意識：

人們目睹了廣播電視中大量增加的現場即時報導。報導者看見什麼就說什麼，行動和敘事幾乎重合，根本不可能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電視在當代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已修改了閱聽人的基本審美規範，譬如何為有效的、令人信服的乃至「自然」地敘述方式。電視媒體的新常規是「一邊生活，一邊講述」，而不是「先生活、後講述」，這種規則已經從實際世界的話語進入虛構敘述的領域（Herman, 1999 / 馬海良譯，2002：108）。

在這種媒介環境下，新聞以「距離現在時間過去多久」的判準被貶值淘汰，人們顯然不會鍾愛那些步伐緩慢、姍姍來遲的新聞，因此，「新聞記者就傾向以速度作為報導實踐的主要原則，他們每天只生活存在於當下，每個消息以它的現時性作為衡量，促成了新聞場域裡以新鮮與過氣的對立來評斷產品與生產者的傾向」（唐士哲，2005）。久之，傳媒組織與閱聽人便潛移默化地認同新聞報導的「即時」原則。

在商品消費領域，由於「一切消費都消耗時間」，壓縮消費時間之流程，縮短購買、使用、與再購買之間的時間差，對加速資本周轉顯然別具意義。在電子媒介營造的消費環境下，人們被期望、也樂意追求時尚，而不斷購買、使用和拋棄，以獲得即時滿足：「被消費的商品能立即使人滿足，……但滿足也應該在完成消費所需要的時間後立即結束，而且這一時間應該減少到最低值」（Bauman, 1998 / 郭國良、徐建華譯，2004：78）。

技術也順水推舟，努力加快消費的速度。當人們使用信用卡與網際網路購買時，消費的時間流程就被大大壓縮，因為「當某人所需要的只是一張信用卡、一部電話和聯邦快遞時，對某一商品的欲望和獲得那一商品之間的時間和空間距離就不會是什麼問題，世界經濟現在根據直接的滿足和便利的相關原則運行」（吳瓊、杜予編，2005：212）。

猶有進之的是，在人際交往中，移動電話、網際網路的瞬時性也使對話雙方很難忍受時間差，人們衡量時間的單位越來越小，所謂「一盞茶」、「一炷香」已無法適應建立於電子媒介技術之上的交往，即時回復是基本的溝通素養。我們總覺得事情很容易生變，必須關切短時間內人際關係的正負變化，時間所隱含的不確定性，並不因為即時性溝通媒介的出現就被克服，只得進一步利用即時性的溝通媒介來與對方保持聯繫，如此循環往復（黃厚銘，2001）。

因此，就日常生活而言，即時性媒介已部分修正了我們的時間規範。社會機制為達到特定目的，努力製造即時時間，期望取得普羅大眾的認同；而當人們習慣於從電視上「同步」觀看遠方事件的現場直播，或使用信用卡與點擊滑鼠「瞬時」作出購物行為，就不知不覺處在了即時狀態。「這些在瞬間便完成的動作不但改變了我們的時間參照系，而且提供了界定期望、現實、判斷真實和虛幻、區分優質和劣質服務以及什麼才是滿意的形式與標準」（McKenna，1997 / 周華公譯，1998：6），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服務，壓縮事件流程直至「即時」，是獲取人們內心認同的重要手段，媒介時間之「內化」就發生在這潛移默化之中（見表一）。

表一：人類社會時間紀律的總體樣貌

時間類型	時間紀律	對時刻的控制	對時間之流的控制
自然時間	順時	以自然現象和生活事件為定時標準	遵循事物發展的自然邏輯
鐘錶時間	準時	遵循抽象數字建立的穩固時間表	將時間視為均質的流逝加以充分利用
媒介時間	即時	建立在時間表之上的即時行動	最大限度地壓縮時間流程

肆、促進時間觀念「內化」之力量

一、自然、鐘錶時間「內化」之力量

時間無形無色無味，普通人只管生活在其中，關注柴米油鹽，體驗喜怒哀樂，對時間背景常已渾然不覺。因而，一個社會要從制度、日常作息到內在思維接受新時間，並非當權者一聲喝令即能辦到，時間觀念之「內化」實非自然發生，也非一種中性的和必然發生的技術變革後果，它是普羅大眾理解、認同與抗拒的過程，是內外力量交織、共同作用之結果。

在自然時間時代，先民完全依賴自然界，尋找食物、生存下來是生命的第一要義，時間觀念因此深受影響，他們不得不「順應天時」，否則就無法存活。因為，無論採集、漁獵、還是放牧等，皆依靠自然界本身的資源，果實的生長、魚類的遊弋、動物的出沒，均與自然節奏保持一致；至於文明程度較高的農業種植，也須按天時地貌行事，才能有所收穫。譬如，尼羅河畔的古埃及人就須順應尼羅河的氾濫時間，「一年一度的水位給農業設定了季節，氾濫、生長和收穫」，因而，「尼羅河的節奏就是古埃及人的節奏」(Boorstin, 1983 / 嚴擷芸、呂佩英、李成儀、吳亦南譯, 1992: 8)。經年累月之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便成為農業生產之最佳時間表。彼時，先民沒有你我這般「幸福」，可以利用溫室、激素改變動植物的自然生長，從而在一年四季都能品嚐到新鮮蔬菜和瓜果，他們惟有順其自然。

除「尋找食物以求生存」的壓力外，還存在一種神秘力量影響先民時間觀念的形成：「他們差不多把一切發生的事都歸因於神秘力量，如巫師、鬼魂、神靈的影響，……原始思維是在一個到處有著神秘力量起作用的世界中進行的，稍有不平常之事，都立刻被認為是這種或那種神秘的表現」(Brühl, 1923 / 丁由譯, 1987: 418)。在神秘思維的牽引下，Brühl 觀察到吉祥日和不祥日的古典分法，「在某些地區，時間被分成吉祥和不祥的方式。……在不祥日他們不出門、不行軍、不做任何緊要的事，而是在家裏無所事事地度過」(Brühl, 1923 / 丁由譯, 1987: 408)。Whitrow (1972 / 文荆江譯, 1982: 2) 則注意到，「瑪雅人認為每一天本身就是一

個神，時間被描繪成一群攜帶各種神物的不同等級的天使，每個天使司掌著不同的時間階段，預兆著他值班時發生的事」。因此，在先民的意識中，「時間並不是以中性的形式出現，而是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神秘的力量操縱著萬事萬物、人的生命，以及諸神的存在，時間因而充滿著各種感情方面的聯繫：它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壞的」（Gurevich, 1976 / 鄭樂平、胡建平譯，1988：315）。

如此可見，「尋找食物以求生存」和「神話故事傳達之神秘力量」即成為自然時間「順時」紀律「內化」之主要動因。透過生存的外力與神秘力量建立的認同感，又因自然時間與人類內在生物節奏具有一致性，「順時」紀律就長久地存在於先民的思維之中，綿延至今仍廣泛散佈。

在安然度過「沒有時間」的漫長時期後，鐘錶時間終於走進日常生活，根據Thompson(1967)之觀察，鐘錶時間的擴散分為三步：一是十四世紀後，發生了在公共空間中普遍設置時鐘的表面現象；二是至少自十七世紀始，在農民與勞工日常生活底層，加速了由「工作導向」轉變為「計時勞動」的觀念變化；三是十八世紀工業資本主義興起，「工作時間同步化」需求增加，工作時間不僅愈接近金錢數量的換算，每日工作時間的分配，也由「普遍不規則」型態，變成為具有很高一致性的工廠標準上下班時間。

這每一步的跨出，無不存在著推動時間擴散的力量。鐘錶作為一種發明，首先獲得了「技術擴散的正當性」理由：「十七世紀的歐洲，奢侈則成為家內事物，女人們開始在家庭範圍內對它發揮影響，奢侈的家庭化也使奢侈本身失去了短暫易逝的特徵，而呈現出持久性，鐘錶則迎合了這樣的需求，擁有鐘錶成為一個家庭身份、地位、財富的象徵」（Sombert, 1967 / 王燕平、侯小河譯，2000：120）。

工廠的大規模生產極大地推動了鐘錶時間的「內化」。資本家首先獲取政治權力修改國家法令形成強迫性壓力，以工資獎懲為誘因，強制改變勞工的工作習慣。失去土地的工人只能被迫遵守新的工作時間框架，以「保有工作機會，獲取報酬延續生活」。

此外，資本家還兼由傳布新教倫理、節省「虛耗」時間宣傳，而試圖將新工作紀律予以「內化」，使勞工自願接受，Weber (1930: 48)即寫到：「浪費時間是首要的罪，也是最致命的罪。人的一生實在太短暫、太珍貴，在交際、閒聊、享樂甚至超出健康之所需的過多睡眠中流失的時間，值得遭到絕對的道德譴責。」最後，「靠所有這些方式——勞動分工、勞動監督、罰款、鈴聲和時鐘、金錢刺激、說教和正規學校教育、壓制定期集市和娛樂，新的勞動習慣形成了，新的時間紀律得到了實行」(Thompson, 1991 / 沈漢、王加豐譯，2002：417)。

與英國工人所處歷史脈絡不同，呂紹理(1998)對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接受標準時間之考察發現，時間紀律受制於殖民政府的牽引，背後的政治控制極為明顯。傳統社會之時間皆受宗教型構，而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時間紀律，則主要由日本政府至上而下的灌輸，形成一套官方論述；此外還透過學年、周、暑假的制約，以及內在算數、體操、國語、修身等課程配合，利用教育影響學生；至於社會大眾，則透過社會宣傳來達到目的，最顯著當屬利用交通運輸系統的推展，確立了「準時」觀念。

因此，在「鐘錶技術擴散的正當性」、「保有工作機會延續生活」、「新教倫理節約時間之宣傳」、「政府官方的灌輸和教育宣傳」、「大型組織（如交通系統）運轉之需求」的多重力量驅動下，普羅大眾的工作習慣、時間概念逐步改變，鐘錶時間「準時」的時間紀律終得以廣泛傳佈。

由上觀之，在時間觀念「內化」為紀律之力量中，生存、生計的壓力（如尋找食物、工作等）始終是主要的外在力量，人們極少能擺脫這種力量的牽引，又因遵守紀律可獲得顯而易見的回報（如按時上崗就不會被克扣工錢），加之宗教因素、宣傳教育等力量，時間紀律便可能逐漸在認同與抗拒中實現內化，成為根深蒂固的文化。

二、媒介時間「內化」之力量

與神秘力量、宗教分對自然、鐘錶時間紀律「內化」之推動不同，媒介時間完全是世俗的，它的「內化」過程不涉及任何宗教信仰的成分，促進媒介時間「內化」之顯著力量主要來自外部世界，這與以往的時間顯著不同。

(一) 時間壓縮技術擴散之正當性

時間縹緲無形，難以捉摸，但人類從未放棄捕捉時間的努力，無論是「月移花弄影」，或將時間比喻成流水、飛梭、白駒過隙之意象，還是發明日晷、沙漏、水鐘、日曆、時鐘、原子鐘等，皆是為再現時間而做的努力。自然、鐘錶時間所依託之時間技術，都建立在再現時間的基礎之上。

而電子媒介卻非再現時間之技術，它僅是因為擁有壓縮時間之功用才意外形塑人們的時間觀念：人們購買移動電話，觀看現場直播新聞、使用電子郵件和即時聊天工具，其初衷可能與時間概念相距甚遠。人們較多是被電子媒介溝通的表面便捷所吸引，或是擔心遊離於電子媒介構建的社會網路之外。概言之，時間在電子媒介技術的擴散之中僅是隱匿的因素之一。

然而，電子媒介對於時間確有其「弦外之音」：每一種電子媒介都有壓縮時間之功能。遠如電報不說，人們熟悉的廣播電視就將資訊傳遞的時間壓縮至瞬間可即，新聞事件與報導已近乎零時間差；如火如荼的網際網路，又在即時基礎上提供了一種延遲模式：新聞網頁可以較長時間地保存，電子郵件排除了電話交流即時回應的焦慮；而移動電話融合了一切加速資訊傳遞的本領，在超越時間、加快資訊流動上幾乎達到極致，在細微之間縮小了發送、接收資訊之間的時間溝壑（卞冬磊、張紅軍，2007）。

由於電子媒介編織的網路，對社會組織與個體都有積極的作用，電子媒介技術便擁有不可抗拒的擴散力量，意外地使得它所蘊含的時間意識也廣泛散佈；又因即時性時間契合人們追求效率的價值觀，因而促進了媒介時間的「內化」進程。

(二) 速度網路中的效率追求

以上曾言，「尋找食物以求生存」、「保有工作機會延續生活」分是自然、鐘錶時間「內化」之生存壓力。生存向來是人類最基本的需要，在自然時間那裏是採集到足夠的果實、獲得農業生產的豐收，在鐘錶時間那裏是按時上下班，完成一定的工作量，獲取相應的報酬。

而在媒介時間系統中，生存壓力的意義已不同於前。在電子媒介構成的網路之中，電話、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到手機，對瞬時傳遞的不斷追逐映證了 Virilio 所創造的速度學(dromology)之「速度決定性的重要性」：「即時通訊的傳播革命取消了所有的時間延續、取消了消息、圖像傳輸的所有延遲，速度，尤其是知識和資訊的溝通的速度已經製造了一個令人迷亂的、膚淺的圖像世界」(Virilio, 1995 / 陸元昶譯，2004: 7)。

而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不可避免處於一定的權力結構之中，要求遵守時間紀律的外部壓力就不會消失。在當下社會，廣泛地使用電子媒介已是社會組織的常識性體驗，人們對事件的組織、處理與回饋，常圍繞電子媒介而發生。按照電子媒介固有的節奏，在最接近即時的效率要求下行事，才是適應電子媒介社會、獲取生存機會的普遍法則。

在這種環境中，社會組織的運轉、企業的經營甚至更廣的社會生活都在追求「第一時間」急速反應的模式下操作，每個處於「資訊高速公路」上的人對於時間無法有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反思，只能追求在當下時間的樣態中立即行動(Poster, 1990 / 範靜曄譯，2000：174)。

換言之，在速度成爲競爭的基礎環境下，如果我們不能根據電子媒介的命令立即行動，不努力壓縮事件的時間流程，而還是在資訊高速公路上按部就班，工作效率便可能大打折扣，工作的效果便可能失去意義，權力就可能會對我們實施懲罰，「養家糊口」的問題便首當其衝。

於是，亙古不變的權力控制下的生存壓力也是媒介時間「內化」的普遍力量。在電子媒介社會，由於權力獲得了即時傳遞的速度，我們也就必然跟隨著電子媒介的步伐，改變自己行動的時間參照，才可與社會步調保持一致，才不至落伍而受到懲罰，甚至慘遭淘汰。

(三) 社會機制利益競逐之驅動

除生存壓力常懸掛於人們心頭外，媒介時間「內化」的歷史脈絡顯然有別於前。論者常謂，主導當下社會運轉的結構已漸由生產轉向消費層面，當今的人們，可能已「不再把工作視為神聖天職，而頂多隻不過是謀生的正當性手段，並借此保有消費的機會。消費成為價值的重心，我們在消費中尋覓滿足和自由，工作與個人解放間長期維持的姻緣結束了，個人解放已與消費再結良緣」(葉啟政，2006：263)。

在此情況下，人們逐漸成為「身份顯赫」的消費者。作為資本運轉中的重要一環，至少在表面上成為制定時間紀律的權力階級。人們漸漸習慣於對日常生活提出即刻性要求，期待個人需求與願望滿足之間無限接近「零時差」，許多社會機制，如新聞媒體、商品生產銷售領域、服務部門等，都逐漸將消費者視為上帝，一味迎合人們的需求。時間便成為競爭的一種手段：以最快的時間提供服務，努力縮短消費者需求與滿足之間的時間差，已是許多服務性社會機制運轉的法則。惟其如此，它們才可能具備時間競爭力，而不被消費者淘汰。

例如，電視新聞的現場直播報導已被電視機構用做提高收視率的法寶。現場直播已獲得定義新聞存在形式的力量，並也決定人們如何針對新聞報導內容做出反應。電視競爭帶來的「瞬時」與「同步」加劇了人們對事物「即時滿足」的需求，「第一時間」成為人們預設新聞事件「時間框架」的心理期待，引發了對「即時」新聞報導之普遍追求。

而 Harvey (1990 / 閻嘉譯，2003：357) 則注意到在商品產生領域，企業試圖加快資本周轉時，主要的變化就是突出產品的即刻性（即刻與快速食品、進餐和

其他滿足)與一次性物品(杯子、盤子、刀叉餐具、包裝、餐巾、服裝等)的價值和優點,且此種影響也進入了娛樂、表演、和消遣等服務領域,加速了「即時」在消費者心中的認同感。

社會機制的利益競爭使「即時」原則成為贏得競爭的策略,無所不在的利益之爭導致了「即時」概念的普遍散佈。在資本運轉構建的回路中,消費者無論主動或被動,都已欣然接受「即時」這一價值觀,成為評判外在事務優劣的標準之一。

綜而觀之,促進時間觀念「內化」之力量幾可歸結為宗教(心理)、生存、社會需求、技術擴散等幾個因素(見表二)。時間觀念正是在這幾種驅動力下逐漸內化,從而深入人心,成為社會結構中或隱或顯的紀律。

表二：自然、鐘錶、媒介時間內化之力量比較

內化力量 時間類型	宗教(心理) 力量	生存壓力	社會需求	技術擴散之力量
自然時間	神話故事傳達之神秘力量	順應自然,尋找食物以求生存	社群自治之需求	無
鐘錶時間	新教倫理視工作與節約時間為天職	遵守時間制度,保有工作機會以延續生活	工廠、交通等大型組織之有序運轉;世界一體化之趨勢	鐘錶擴散的正當性
媒介時間	無	跟上電子媒介節奏,以使工作有效而不被淘汰	社會組織資本周轉與利益競爭;電子媒體運轉的法則	電子媒介擴散的正當性

伍、抗拒的無奈：時間紀律之平衡

媒介時間之「即時」,意味著立即行動和當場完成,等同於「瞬間」、「片刻」、「一霎那」、「迅雷不及掩耳」等語彙。在電子媒介社會,把起點和終點分隔開來的時間經驗正在減少,時間這個曾被用來表明時間流逝和計算的概念,已失去許

多意義。「即時」時間是一些沒有維度的點，Bauman（1999 / 歐陽景根譯，2002：186）因而問道：「這樣一個由時間片刻聚合而成的時間形態，還是如我們所知道的時間嗎？『即時』時間這種表達，難道不是一個矛盾的形容，我們不仍要在一天 24 小時的座標裏度過嗎」？

誠如其言，「即時」實質不過是一種時間感知的傾向罷了，它無限接近於零，但永遠達不到零。而且，自然、鐘錶時間並不會消失，新時間觀念僅是豐富了我們的時間經驗而已。在日常生活的「時間金字塔」上，自然時間仍是最為基礎的那一層，人類社群在很多方面仍然無法、也不可能全然脫離自然界，那麼就必須按其規則行事；鐘錶時間作為協調社會運轉的工具，必然在社會系統中占核心地位，我們因為統一的時間標準而成為共同體；媒介時間作為新生的時間觀念，則在電子媒介構成的網路之中，擁有一席之地，定義著一種生活狀態的時間概念。

以上論述，猶令人疑竇叢生的是，社會意識的擴散並非全然是中性的過程，此處純然探討「內化」與「紀律」，而將人類主體對時間的抗爭置於何地？正如 Thompson（1991 / 沈漢、王加豐譯，2002：417）在探索「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時告誡：「需要說明的是不是一種生活方式優於另一種，而在於（時間變遷）是一個最有深遠意義衝突的地方，在於歷史記載不是一種中性的和必然發生的技術變革的簡單記錄，它是剝削和抵抗剝削的過程，價值觀得到一些東西的同時又失去了一些東西。」

誠言之，人類對時間的抗拒從未停滯。從人們透過引進溫室改變植物生長的自然週期，從而打破季節對瓜果蔬菜生產的約束；及工人們在流水線上技巧性地運用「go slow」的策略，降低時間的控制感；至電子媒介社會出現的「低資訊食譜(low information diet)」，減少看電視、使用網際網路和移動電話的努力，無不說明人們希望成為「時間的主人」，減少時間紀律之束縛，從而自由地操控時間。

脫離時間紀律的控制，往往意味著身心自由。然而，在理論上卻存有先天的悖論，因為我們就生在時間之中。換言之，我們不是處於這樣的時間之中，就要

處在那樣的時間之中，我們實質就像時間海洋裏的一條游魚，永遠無法脫離大海的框架。普通人欲求達到忘記時間、忘記自我甚至「天人合一」的狀態，實非易事，也非日常生活中的常態。因而，無論是在流水線上的片刻怠惰，還是減少使用電子媒介逃脫資訊網路的願望，我們總是在既定的時間框架內做這樣或那樣的努力。

然而，爭取人的主體性，是生而為人的重要任務，全然抗拒時間的無奈並不意味著應人們停止鬥爭，相反，約束與反抗總是一對孿生兄弟，在既定的時間框架內人們仍然孜孜以求，期望成為時間的主體。我們雖無法全然脫離時間紀律，卻可以試圖在「順時、準時、即時」紀律的框架內，按照社會或身心的需要自主切換，建立一種動態的平衡機制，改變一味被動地處於某種時間紀律的控制之中，而獲得相對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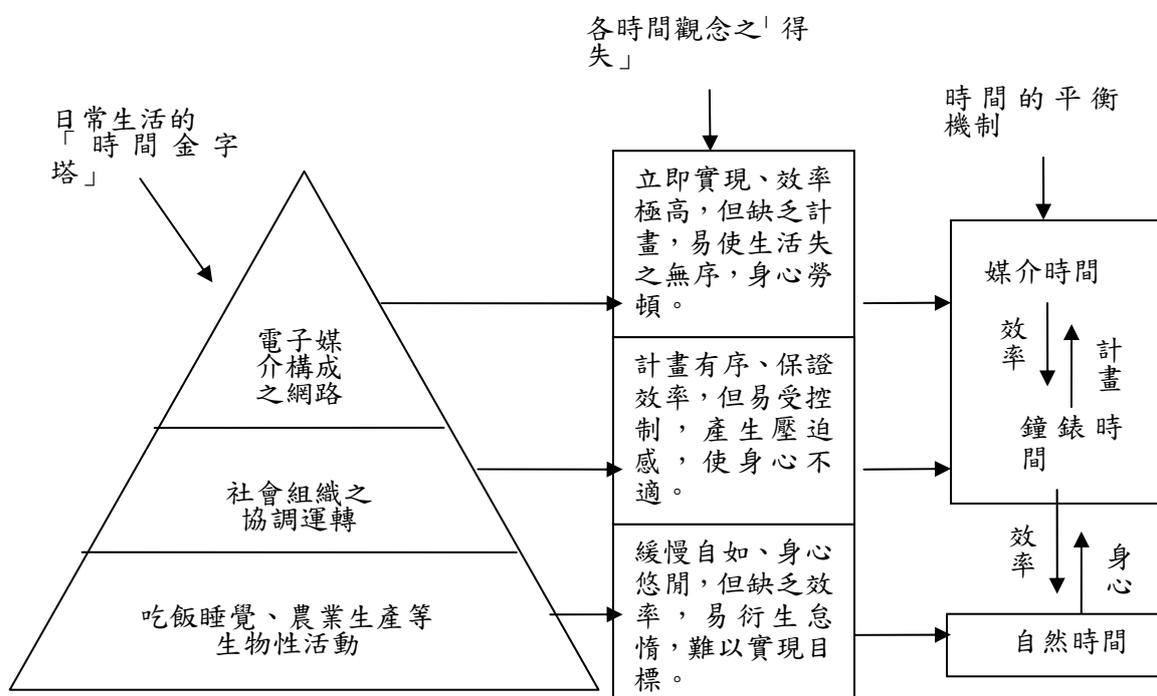
自然、鐘錶與媒介各時間，擁有各自特性。媒介時間之於鐘錶時間，在效率上更「勝」一籌，卻缺乏計劃性；媒介時間、鐘錶時間之于自然時間，效率自不必說，卻「輸」在身心的自由上。總體而言，在電子媒介社會，我們更多地受鐘錶時間、媒介時間的控制，更多地關注效率，而使得身心缺乏自由得感覺，因此，在自然時間中尋找平衡的機制即成為芸芸眾生首當其衝的任務。

因此，就對付媒介時間之「即時」紀律而言，「延遲」概念就顯得尤有必要。所謂延遲，就是「通過推遲、拖延和延緩在場，來控制一個事物存在的可能性，來和它保持距離並遲滯它的即時性」（Bauman, 1999 / 歐陽景根譯，2002：242），透過延遲，人們才能體驗出需求與滿足之間的那一段距離，彰顯實現(fulfillment)之意義。

這一假想並不荒唐，放眼當下世界急速的全球化趨勢，造成了「公民身份在求快求新的市場邏輯霸權中面臨被掏空命運、明辨反思溝通困難重重、批判意願與能力鈍化」，趙剛(2001)以發展「慢社會學」作為平衡速度之翹翹板：「慢社會學意在用民主的延遲反應抵抗貫穿市場與網路的實存時間、讓公共討論指導效率機

器、以慢打拆解決攻，從而尋求被失控的市場機制之重力加速度所挾持的市民社會及其片斷，復歸相對自主性的可能」。

與這樣的學術探討相較，我更願意普羅大眾分享「慢食」、「慢走」、「慢活」等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繫的語彙和經驗。在媒介時間、鐘錶時間的控制下，當下社會長期在「效率優先」的原則之下運轉，「效率」與「身心」的衝突已是我們能夠深切體會的心情，反思因而漸漸孕育。雖「慢食」、「慢走」、「慢活」不是抗拒媒介時間、發展平衡機制的全部處方，但至少是其中最為淺白實用的那一部分。在電子媒介社會，適度地回到鐘錶時間以尋求計劃性，適度地切換到自然時間以追求身心的緩慢悠閒，就顯得尤其重要（見圖一）。



圖一：「時間金字塔」及時間的平衡機制

陸、結語

猶需交代的是，在社會的「橫切面」上，時間不僅在不同的文化之間存在差異，而且在每個文化系統的內部也不盡相同。時間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感知、體驗它的各個階層，它在各群體的意識中並不是均勻流逝的，而是像他們所感知、體驗的那樣以不同的節律發揮作用。即使如本文這樣在社會「縱切面」上的探索，也僅局限於觀察各個社會的主導性時間，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不同階層之間的體驗，時間的複雜和多樣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和描述。換言之，「在每個社會不是存在唯一一種『鐵板一塊』的時間，而是存在一系列由不同法則和由不同人群性質控制的社會節律」(Gurevich, 1976 / 鄭樂平、胡建平譯，1988：329)。

錯綜複雜的時間觀念，豐富了我們生而為人的經驗，但我們應意識到時間觀念的多樣化並不意味一種時間下的生活方式優於另一種：當人們一味努力追求生活在自然時間狀態時，就可能丟失勤勉上進的精神，「古老的群眾文化在許多方面是怠惰的，理智是空虛的，缺乏刺激以及極端的貧窮」；鐘錶時間雖可能使人們失去一些身體與心靈的自由，但「準時」多少培養了一些積極的態度，「沒有這樣的一種時間紀律，我們可能就不會有堅持不懈的精力」(Thompson, 1991 / 沈漢、王加豐譯，2002：421)；而媒介時間之「即時」雖可使人們的工作、生活更加有效率，卻也可能讓我們失去對生活的控制感，在極速中錯失許多美好風景和浪漫溫情。

此外，伴隨個體成長或歷史綿延，時間紀律可能會在生命旅程裏此消彼長，卻不存在完全取代，它們總在某些時空起到約束作用。理想的狀況是，我們能建立起多樣化的時間模式，在各紀律之間自由穿梭：許多事情可用一種快步調的方式來處理，迅速、準時、以未來為導向、視時間為金錢；而像休息、閒暇、計畫的醞釀和社會關係，則可任憑其按自己的時間性發展，以自然的方式來對待。如果這只僅限是理論上的可能，那麼，至少我們應保有這樣的意識：若能擁有在不同時空適應與平衡不同時間紀律的本領，生活才更可能遊刃有餘，生命的樂趣才

更可能彰顯。

本文作者無法給出、也不贊同出版界那漫天飛舞的時間管理妙方，因為任何有形的時間計畫，都可能使人沉浸在單一的時間紀律之中不能自拔，對於微妙的時間而言，「社會意識的成長，像詩人心靈的成長一樣，歸根到底不可能按計劃來進行」(Thompson, 1991 / 沈漢、王加豐譯，2002：425)。

參考文獻

- 卞冬磊、張紅軍（2007）。〈媒介時間的來臨：電子傳播媒介的時間想像〉，《新聞學研究》，90：101-140。
- 卞冬磊（2008）。〈膚淺的縱深：媒介時間之社會影響〉，《資訊社會研究》，14：101-132。
- 呂紹理（1998）。《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
- 邱澎生（2000）。〈工作時間研究與 E. P. Thompson〉。上網日期：2000年09月28日，取自：<http://www.sinica.edu.tw/~pengshan/workingtime.htm>。
- 吳瓊、杜予（2005）。〈綠色行銷與商品自我〉，《形象的修辭——廣告與當代社會理論》。頁：199-228。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吳國盛（1996）。《時間的觀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穀城（2003）。《中國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唐士哲（2005）。《在速度的廢墟中挺進：電子媒介新聞的唯物批判觀點》。《新聞學研究》。第84期。頁：79-118。
- 張春興（2000）。《張氏心理學辭典》。臺北：東華書局。
- 黃厚銘（2001）。〈Heidegger 的哲學思想與資訊科技〉，《資訊社會研究》，1：1-31。
- 葉啓政（2006）。《社會理論的本土化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趙剛（2001）。〈為何反全球化？如何反？——關於全球化的一些問題的思考與對話〉，《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4：49-146。
- 臧國仁、蔡琰（2003）。〈再論新聞報導與時間敘事——以老人新聞為例〉，《新聞學研究》，83：1-38。

- Andersen, A. (2000)。 *知識管理第一本書 (Business Consulting)* (劉京偉譯)。臺北：商周。(原作 1999 年出版)
- Bauman, Z. (2002)。 *流動的現代性 (Liquid Modernity)* (歐陽景根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原作 1999 年出版)
- Bauman, Z. (2004)。 *全球化——人類的後果 (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 (郭國良、徐建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 1998 年出版)
- Bell, A. (1995). *News Time. Time & Society*, 4(3), 305-328.
- Bell, D. (2001)。 *意識形態的終結 (The End of Ideology)* (張國清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作 1988 年出版)
- Boorstin, D. (1992)。 *發現者——人類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歷史 (The Discoverers: A History of Man's Search to Know His World and Himself)* (嚴擷芸、呂佩英、李成儀、吳亦南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原作 1983 年出版)
- Castells, M. (2001)。 *網絡社會的崛起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夏鑄九、王志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作 2000 年出版)
- Durkheim, E. (1965) .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translated by J. W. Swain. New York: Free Press.
- Elias, N. (2005)。 *論文明、權力與知識 (On Civilization, Power and Knowledge: Selected Writings)* (劉佳林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作 1998 年出版)
- Evans-Prichard, E. (2002)。 *努爾人--對尼羅河畔一個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 (The Nuer: Descripti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ood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褚建芳、閻書昌、趙旭東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作 1940 年出版)

- Foucault, M. (1999)。規訓與懲罰 (*Discipline and Punish Discipline -The Birth of Prison*) (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原作 1975 年出版)
- Googale, T., & Godbey, G. (2000)。人類思想史中的休閒 (*The Evolution of Leisure: 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成素梅、馬惠娣、季斌、馮世梅譯)。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原作 1995 年出版)
- Gurevich, A. J. (1988)。〈時間：文化史的一個課題〉《文化與時間》(*Time as a problem of cultural history. In L. Gardet et al., (Eds.). Cultures and time*) (鄭樂平、胡建平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作 1976 年出版)
- Harvey, D. (2003)。後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 1990 年出版)
- Herman, D. (Ed.). (2002)。新敘事學 (*Narratologies*) (馬海良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原作 1999 年出版)
- Husserl, E. (2000)。內在時間意識現象學 (*Vorlesungen zur Phanomenologie des Inner Zeitbewusstseins*) (楊富斌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作 1980 年出版)
- Johnston, R., Gregory, D. & Smith, D. (1995)。人文地理學詞典選譯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王志弘譯)。臺北：唐山。(原作 1993 年出版)
- Kelman, M.C. (1958). Compliance, Identifi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Three Processes of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 51-60.
- Levine, R. (2000)。時間地圖 (*A Geography of Time: The Temporal Misadventures of a Social Psychologist, or How Every Culture Keeps Time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範東生、許俊農譯)。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原作 1997 年出版)

- Levi-Strauss, C. (2000)。憂鬱的熱帶 (*Tristes Tropiques*) (王志明譯)。北京：三聯書店。(原作 1973 年出版)
- Lévy-Bruhl, L. (1987)。原始思維 (*Primitive Mentality*) (丁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 1923 年出版)
- Marx, K. (1963)。資本論 (第一卷) (*Capital, vol 1*) (郭大力、王亞南譯)。北京：人民出版社。(原作 1867 年出版)
- McKenna, R. (1998)。時間角逐 (*Real Time: Preparing for the Age of the Never Satisfied Customer. NY: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周華公譯)。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原作 1997 出版)
- McLuhan, M. (2004)。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 of man*) (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原作 1964 年出版)
- McLuhan, E. & Zingrone, F. (2000)。麥克盧漢精粹 (*Essential McLuhan*) (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原作 1995 年出版)
- Poster, M. (2000)。資訊方式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範靜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原作 1990 年出版)
- Schudson, M. (1986). What Time Means in a News Story. *Gannett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 Occasional Paper. No.4.*
- Sombert, W. (2000)。奢侈與資本主義 (*Luxury and Capitalism*) (王燕平、侯小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作 1967 年出版)
- Thompson, E. P. (1967). Time, Work-discipline and Industrial Capitalism. *Past & Present*, 38, 56-97.

- Thompson, E.P. (2002)。 *共有的習慣 (Customs in Common)* (沈漢、王加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作 1991 年出版)
- Urry, J. (2003)。〈關於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Blackwell 社會理論指南》(*Sociology of Time and Space. In B. Turner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Theory, P:504-535*) (Bryan S. Turner 編，李康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作 1996 年出版)
- Virilio, P. (2004)。 *解放的速度 (The art of the motor)* (陸元昶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原作 1995 年出版)
- Vygotsky (1978)。 *Mind i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 (1930)。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Allen & Unwin.
- Whitrow, G. (1982)。 *時間的本質 (What is Time? The Nature of Time)* (文荆江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原作 1972 年出版)

The Internalizing of Media Time: The Forming of Time Discipline in Electronic Media Society

Dong-Lei B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ocess of internalizing of the media time. In the electronic media society, "instant" discipline has been formed and infiltrated widely because of the media time.

The writer also believes that three time disciplines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our society. These disciplines can be named respectively as "Obedience", "Punctuality" and "Instant".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ligious influence, survival pressures and technical power are the main impetus behind the modern time, promot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pace of time internalization. For the media time, "Instant" discipline is forced by survival pressures, interest competi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s and the wide use of media technology. Facing the complicated disciplines, we shoul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balance in different places and different time.

Keywords: internalizing, instant, media time, time discipline